

档案时空

都市快报与浙江省档案馆合作栏目

老校长竺可桢(下)
校训求是 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

(上接第10版)

想方设法保护四库全书

老浙大的校舍条件比较差,因为竺可桢总想多节约点钱下来,多采购图书设备,多想办法买点好书。

1945年浙大教授李春芬未回国时,听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批复本书要赠送外国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我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已有人去征集。那时他还不算浙大的正式教师,因1944年竺可桢曾电约过他去浙大执教,于是他便以浙大教授的名义,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接洽。经同意后,代浙大收集了约1000多册图书,后来免费运到浙大。对此,竺可桢特别高兴,特意为此写信给他的晓峰老师,表达他的欣悦之意。

他对故乡的文物图书也特别重视保护。1938年底,因抗战打响,浙图已将图书与其他善本运抵龙泉秘藏。竺可桢认为留浙欠妥,应西运贵阳保存。教育部采纳了这个意见,由浙大派员会同浙图人员运黔。

在贵阳市区还不放心,改运至山乡地母洞。又因洞中潮湿,每年须翻晒整理,管理员一人不可胜任,竺可桢主动每年夏季派中文系教授一二人协助晒书整理。

独山战起,浙大本身处危不动,竺可桢又赞同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运到重庆,并任阁书保管委员会委员。

当库书尚未西迁时,这批笨重的线装书(包括方志及善本)初运至浙江富阳,须迅速转运浙南。但当时船只极少,浙图又没有自己的卡车,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幸赖竺可桢对浙图的同情,对文物图书之重视,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

文澜阁存书寄藏在贵阳时,贵州大学想借其中滇黔人之著作,一度想借借至该校。战后,四川公私方面亦张言,东北收复,北有文渊,西南似应有一部。更有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私访浙中父老,企图打通政府,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归之于南京(详见浙江档案馆藏《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张宗祥之《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纪实》一文)。浙江省参议会代表民意,力主留在浙江省。竺可桢与弟子陈训慈一直代浙图与各方联系。论及此事时,竺可桢在信中义正辞严,充分显示其对文物图书的重视与爱护,以及对故乡的那份深爱。

家乡是个好地方

他常对外甥甥其泳说:“家乡是个好地方,是江南有代表性的鱼米之乡,山清水秀,河边秋红春绿的柏树,自然风景很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雄和有作为的人物。”

他于抗战后也几次归来。解放以后,他担任科学院副院长,还照顾几个研究所的大事,工作很忙,因此很少有机会南归,但也有两三次回到东关镇老家竺家台门来看看。

最后一次扫墓大约在1963年9月间,是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来浙江省视察时,顺便到老家一转。他那一天说:“中国科学已经落后了100年。例如世界上先进国家生产和生活都早已经电气化了,但我国还是用陈旧机器和人力生产。如果国家重视科学,培养大批专业人才,那用不着几十年就会改变落后面貌,人民生活也就普遍提高了。”

他还说:“东关在绍兴县属是个大镇,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发电厂,真可惜。我回去发信给县里,建议创办一个发电厂。”

过了一年多,东关果然办起了发电厂、碾米厂,给东关人民带来很大方便。

确立“求是”校训

因为爱浙江,竺可桢也特别崇拜浙江的名人王阳明。

1938年11月,竺可桢发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专题演讲,认为今日颠沛流离中,欲自觉觉人,应以先贤的嘉言懿行和丰功伟绩,作为吾辈的矜式。因地思人,王阳明先生的行谊,最可作今日大学生的典范。他自浙江至贵州谪居两年,所走路线与



1937年秋,竺可桢(中)在天目山禅源寺考察浙大搬迁校舍事宜。

浙大西迁路线相合。他治学躬行,坚贞负责和忠心报国的精神,尤其值得浙大学生来学习。他的“致良知”学说,也就是“求是”精神的注释。

竺可桢引用王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一语,认为“无心同异,惟求其是”。这种博大不立门户的精神,推至浙大历史的渊承,深维治学的精义,是求是校训的最好注释,已融入了求真的精神。

在这位前辈的指引下,他提出了求是校训。

具体时间是在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校长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上确定了“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竺校长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

1989年1月,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确定为国家教委综合改革试点院校后,学校提出了“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口号,并将其概括为“求是创新”。

1997年学校百年校庆时,新建校大门的横梁上端阳刻着“浙江大学”四个大字,而在横梁的两侧下方,由十六块大理石浮雕用变体文字书写“求是创新”四字,用阴法雕刻分列两边。既体现出浙江大学的百年辉煌,又昭示浙江大学更加灿烂的未来,“求是创新”已成为新世纪浙江大学师生的行动指南。

一个人在地球上也和细菌差不多

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人,个人生活也很让人敬佩。

浙江省档案馆内藏有他1946年6月19日的一封信,这样写道:“中国纺织公司杭州办事处执事先生台鉴:敝人自重庆来杭,因乘飞机不便多带行李,故拟制棉被数条,特呈准准洋白细布一匹,照教教人员特价让购为荷。”

堂堂大学校长为制棉被还得专门打报告,这在今天绝对无法想象。可这就是竺可桢的为人处世态度。

任浙大校长后,浙大农学院有大量的农产品,如牛奶、牛油、鸡鸭、蛋、西瓜、番茄、花木等,他从未揩油白拿,和一般顾客一样付款购买。

在学校办公费用开支上,他也很节约。他的一支自来水笔,用了三十几年。开校务会议由学校备便饭,他不准供应老酒。陈建功先生有酒瘾,每餐非喝酒不可。他也不批。陈先生只好自己暗地里叫工友去买一瓶,由他自己付钱。

浙大录取新生,竺可桢女儿竺梅分数不理想,他没有通融。省内当局曾托人为其亲属求情,他也回一句:“叫他来考好了。”

学校分给他好的洋房,他连连回绝,说就在办公室楼上安排两个房间就够了。寒冬腊月,他的办公室也从来不生火。因楼板单薄,楼上有人走动时,楼下也会摇曳。

他上下班从来都是步行,只有到远处公干时才乘专用汽车。

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记载,浙江大学戏剧和德语教师张君川回忆说,竺校长有一次在艺专和潘天寿校长吃饭,因司机有事早回,潘校长问竺可桢能否坐他的三轮车回家,会不会太委屈了。

竺可桢说了一个比喻:天上的织女星一颗星也比太阳大得多,太阳又比地球大得多,一个人在地球上也和细菌差不多。如果自以为不得了,那不太可笑了吗?

一生积蓄只能买几担米而已

浙大西迁中,他更是跟学生一起同甘苦。

中国金属材料专家王启东教授(当时浙大学生)在回忆中提到,当时教师在食堂里,一块木板打几个桩,钉在地上就是凳子。吃饭是“蜻蜓点水”(蘸着盐汤下饭)、“逢六进一”



1937年12月,浙大师生从建德乘船再次西迁。

(吃六口饭蘸一点霉豆腐)。灯是桐油灯,三根灯芯,一般只点一根,看书点三根,教授和学生的鼻子都被熏得黑黑的。

西迁途中,竺可桢还承受了众多不幸和悲痛。在江西西泰和,夫人张侠魂、次子竺衡相继病故。他匆匆料理好丧事,第三天又马上回校工作了。

他本来有汽车,但每次防空警报拉响,他都没有躲进汽车,而是跟师生一起躲防空洞,不让自己有任何特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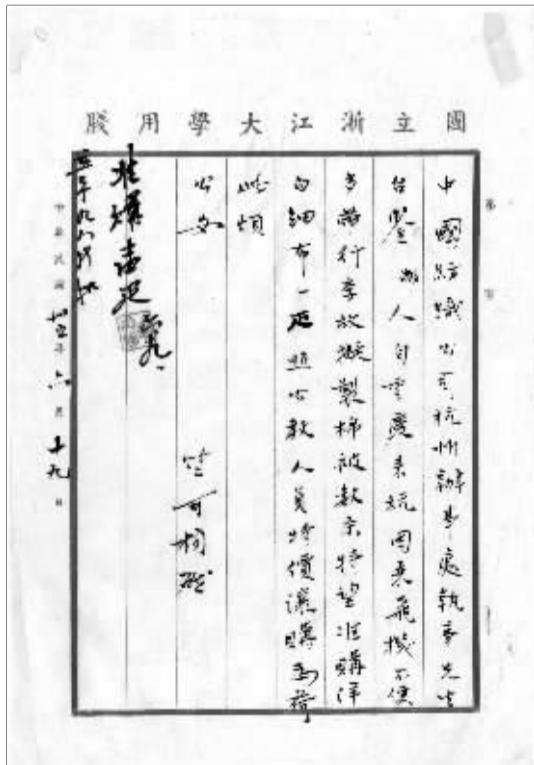
1941年,浙大在遵义时,物价飞涨,几乎一天三变,生活大受影响。竺可桢偶然在衣箱中翻出上海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单据,已经满期,取回两千元,此时只能买几担米而已。他说:“一生积蓄仅此而已,岂他人所能信哉。”

这样一个爱老师和学生如己、爱学校如家、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苛至极的校长,至今为浙大人铭记。

如今,浙大学生走进校园第一件事就是要回答竺校长提出的两个问题:“你到浙大来干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每年浙大新生入学的时候,学校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学校又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

看似简单的两个问题,把纷繁复杂的人生抉择梳理得清清楚楚。这两个问题相信将永远提醒着浙大学生,影响着一代代浙大人,也提醒着大家记起这位可敬可爱的老校长。



竺可桢为制棉被写的报告



好看好玩有知有见。

“鲤鱼君”是都市快报“漫阅读”周刊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扫描二维码,关注鲤鱼君,可收看更多精彩文章。